

doi:10.3969/j.issn.1674-8131.2010.06.009

从世界经济史视域看中国现代经济发展^{*}

隋福民

(中国社科院 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摘要: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经济发展也与世界紧密相关。一方面,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经济发展的场景,当然世界作用于中国经济不只是积极的,也有消极的一面;另一方面,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有着共同的律动,又有自己特色,独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使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关键词:世界经济;现代经济;经济发展道路;工业化;计划经济;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图分类号:F119;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0)06-0051-09

On China's Modern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Perspective of the World Economic History

SUI Fu-min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100836, China)

Abstract: China is a part of the worl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y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world. On the one h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modern economy can not be separated from global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ourse, the effect of global economy on Chinese economy is not active and has passive factors. On the other h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can not be separated from China.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road has the same law wit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roads of other countries but has self-characteristics. The unique development road of socialism market economy makes achievement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ch becomes the focus of the world attention.

Key words: the world economy; modern economy; economic development road; industrialization; plan economy; reform and openness; socialism market economy

一、引言

中国经济发展是历史上的一个宏大叙事,现代中国经济改革的奇迹更是构筑了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别样风景。审视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尤其是现代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及由此引致的“中国奇迹”,是中国经济史研究者义不容辞的学术责任。近年

来,学者们在此领域内多有建树,成果迭出。然而,一个明显的不足是视域不够宽广。经济史作为一门经济学和历史学的交叉学科,其本质上是“史”。历史是不间断的,今天的现实离不开昨天的历史,而昨天的历史又深嵌在前天的历史尘埃中。人类社会的历史也不是孤独的行者,即便是农业文明时

* 收稿日期:2010-09-23;修回日期:2010-10-25

作者简介:隋福民(1972—),男,辽宁阜新人;副研究员,博士,2007年于北京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现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经济史方法论、世界经济史和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TEL:010-68034417, E-mail:suifumin@163.com。

代,各大文明也有着同频共振性,并非完全阻隔。地理大发现以来,经济全球化迅速推进。因此,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可能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状态下发生,中国也是如此。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尤其是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忽视历史和隔绝世界都是致命的错误。

有鉴于此,本文拟把中国现代经济发展放置在世界经济史视域中加以讨论,以此来增进对中国现代经济发展道路的认识。下文分为三个部分:(1)中国现代经济发展与世界相连;(2)中国现代经济发展道路:“共同律动性”和“道路独特性”的统一;(3)历史回眸与思考:中国与世界。

二、中国现代经济发展与世界相连

从历史上看,亚欧大陆很早就有经贸和文化往来。比如,汉朝时张骞的出使西域,沟通了中华文明和域外之间的联系,丝绸之路也成为亚欧大陆文化、经济交流的大通道。唐朝时玄奘大师的西行取经,反映了那一时期中华文化对域外佛教的接纳和吸收。宋朝之后,中华制度和技术向世界的广布,尤其是向欧洲的传播,为欧洲的文艺复兴乃至工业革命都贡献了力量。明清时期,欧洲传教士在中华大地的活动以及天主教教义被中国上层士大夫和下层民众的渐进认可,都说明自古以来中国与世界的交流就不曾间断。

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同样离不开世界情境。不论是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因素,世界总包围在中国的周围,中国也不能选择离开,即便是有封闭的想法或者是被世界赋予一个封闭隔绝的环境时,也不能阻断世界和中国的联系。因此,审视中国现代经济发展需要注意世界因素,甚至于需要一种“全球史观”。因为“现代世界是一个由不同国家民族不同力量在不同领域的相互创造生成的系统,离开了这个系统,任何所谓普遍有效的假设,诸如理性或进步、自由,都不足以成为历史的尺度。”^[1]

第一,工业化建设起点。这个起点是与世界相关的。首先是中国工业化建设的物质基础的薄弱。据麦迪森(Angus Madison)估计,1820—1952年期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分别为0.22%和-0.08%,欧洲则分别为1.71%和1.03%。^[2]1952年,中国在全球GDP中所占的份额比例从1/3降到了1/20,它的实际人均收入已经

降低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4。^[3]根据国内学者的研究,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时,全国工农业的总产值只有466亿元,人均国民收入只有66.1元。^[4]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占到84.5%,工业总产值比重为15.5%,而重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仅为4.5%。^[5]总之,“19世纪后半叶以来,由于中国封建统治的顽固和外国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近代的生产举步维艰,生产力发展水平严重滞后了。”^[6]其次是被封锁的国际环境。新中国成立前的“七届二中全会”前后,毛泽东曾暗示对美国要有一个和解的政策。他说:“剩下的帝国主义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可以让它们暂时存在,由我们加以监督和管制,以待我们在全国胜利以后再去解决。”^[7]¹⁴³⁴⁻¹⁴³⁵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他又强调:“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7]¹⁴⁶⁶1949年5—6月间,中共也曾通过原燕京大学的学生黄华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有所接触,希望中美关系得到改善。^[8]但这一诉求并没有实现。抗美援朝以及由此而引致的台湾问题则加剧了中美之间的对立。结果是,中国在建国之初就面临一个被封锁的国际环境。

第二,建国初期工业化道路和模式的选择。中西文化、制度和经济的直接碰撞,尤其是鸦片战争失败,大大刺激了古老帝国。这使得工业化、现代化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仁人志士的不懈追求,他们从各种角度进行“求解”:洋务运动,百日维新,辛亥革命等。“求解”的背后隐含着中国和世界的紧密联系。洋务运动秉承的理念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要诉求是技术上进步;百日维新反映的是制度变革的期盼;百日维新的失败造就了一场彻底变革封建制度的需求,即为辛亥革命。当然,这些努力都没有根治中国主权不完整的痼疾,没有将西方列强真正地拒之门外。马克思理论和苏联的“十月革命”为中国送来了“新思想”,在这种思想影响下,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经过多年的战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对于中国历史来说,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中国的主权重新获得了完整,中国社会恢复了稳定,中国有了进行工业化建设的条件。在马克思理论

的指导下和苏联榜样力量的影响下,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而且采取计划经济模式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在当时的知识存量下,这是一个合理而且现实的选择。因为,苏联经济通过计划经济模式在20世纪30年代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增长,其经济增长速率之高让西方工业化国家刮目相看。而且,在当时受封锁的环境下,中国面临着经济快速崛起的政治任务。尽管20世纪30年代以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为代表的一批奥地利经济学家与以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为代表的拥护“市场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之间就苏联模式有过一场争论,但大萧条并没有让米塞斯和哈耶克占据上风。

第三,计划经济时期的技术引进。在以美国为首的全球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封锁、禁运的环境下,新中国只有接受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资金、技术和设备援助。通过以“156项”为核心、以900余个大中型项目(限额以上项目)为重点的工业建设,使中国大地上史无前例地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雏形。^[9]大约有1.2万名苏联技术专家来到中国,2.5万多名中国技术专家和成千上万的中国学生被派往苏联。^[10]当然,中国是通过等价交换来获取援助的,即为苏联提供了其稀缺的廉价农产品、稀有矿产资源等。苏联能够援助中国也是为了增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正如赫鲁晓夫所言:“我们对中国的援助不是无私的,是有私的。因为我们援助了中国,中国强大了反过来也就是对我们苏联的支持。”^[11]通过技术设备引进,中国工业技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达到了世界20世纪40年代的水平。1960年,前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技术人员,中国一些建设项目被迫中断。从1963年开始,中国从日本、联邦德国、英国、意大利、法国等国家引进了石油、化工、冶金、矿山、电子和精密机械等方面的技术和设备,部分地填补了中国工业的空白。20世纪70年代,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中国与西欧国家关系的最大障碍得以消除,中(西)欧关系揭开了新篇章,同时,中日邦交关系实现正常化,中国迎来了第三次技术引进。1973年初,国家计委按照周恩来的要求,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建议利用西方处于经济危机、引进设备对我有利的时机,在今后三

到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其中包括已经批准的12.5亿美元进口设备),史称“四三方案”。引进的重点是解决吃穿用的问题,加强支农工业和基础工业。这次引进,基本上体现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国际上的技术革新趋向。^[12]

第四,“大跃进”。“一五计划”提前完成,并且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这大大增强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自信心。同时,国际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出现,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心理上产生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促使急躁冒进的心理形成。1957年11月2日至21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时,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苏联的两颗人造卫星上天,标志着两大阵营力量对比的新的转折点。并说,现在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当赫鲁晓夫表示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时,他也强调:“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15年后,在我们阵营中,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得到持久和平了。”^[13]为了加快工业化步伐,“毛主席觉得可以探索一种更高的发展速度,把群众发动起来,而且把全国发动进来,生产一定会大跃进。”^[14]然而,“大跃进”和随后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无疑是负面的。据美国华人学者邹至庄的估计,如果没有这两场运动,1990年的人均产出和消费可能是实际观察值的2.7倍。^[15]追溯这两场运动之因,固然离不开中国自身的责任,包括体制、文化等,但世界经济格局对领导人所施加的认知上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第五,改革开放。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格局出现由两极化向多极化发展,这让中国领导人认识到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1985年3月4日,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邓小平明确地阐述了他关于当代世界主题的观点:“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16]¹⁰⁵为了发展经济,中国必须改革开放。他说:“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300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200年

的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历史经验教训说明,不开放不行。”^{[16]89-90}“根据中国的经验,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是不利的。要得到发展,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改革,包括上层建筑领域的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国执行开放政策是正确的,得到了很大的好处。如果说有什么不足之处,就是开放得还不够。我们要继续开放,更加开放。”^{[16]202}改革开放当然也离不开毛泽东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努力。20世纪70年代,世界格局的变化赋予了中国改善与发达国家关系的契机,这“为以后实行对外开放作了铺垫”。^{[17]16}改革开放的另一个推动力是中国与西欧、日本等国的差距。1978年5月,中央派谷牧率代表团考察西欧。结果是看到中国与欧洲各国在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巨大差距。同年秋天,邓小平访问日本,指出:“我们要向一切发达国家请教,向第三世界穷朋友中的好经验请教。”^{[17]58}因为,日本70年代的增长速度非常高。中日差距逐渐加大,如果不改革开放是没有出路的。20世纪60年代,中日两国GDP还大体相当,而到了1980年,日本已经是中国的4倍。1978年11月,邓小平访问新加坡,也看到了加强对外经济联系,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重要性。这一时期,英美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科技继续在上领跑。20世纪70年代末,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在英国出生,美国正掀起新科技革命的浪潮。这一切,都促使中国要摆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束缚,从困境中重新奋起,赶上国际上的新一轮科技浪潮,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汇入世界文明潮流。

第六,转轨目标的选择。中国在转轨初期并没有明确的蓝图,而是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策略。在开放实践中,广东、福建先行,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成为四个经济特区,作为吸引外资和技术以及文化观念、利用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发展经济的平台和窗口。在农业改革实践中,尊重农民自发的选择——非集体化,1979年的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把这种制度变迁定义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工业上的放权让利同时展开。随着政府“有形之手”的不断退出,家庭、企业重新回到市场上,通过市场“无形之手”对资源进行配置。到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和中共“十四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制度才正式确立为中国制度变迁的目标。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道路的选择,实际上不是个人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因为,市场经济制度是人类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经过自然淘汰不断优化而保留下来的最适宜的经济发道路,发达国家之所以经济发达就是因为较早选择了市场经济制度。无论是欧洲的英国、德国、法国,还是美洲的美国以及东亚的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都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市场经济制度。市场机制的优势在于,它符合了个人自利的天性,具有内生的激励机制和持续发展的动力;以此为核心的经济制度,能够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大大提高制度运行的效率。这既是经济学研究一致的结论,也是人类社会实践文明的成果。中国历史上也具有市场经济传统。

第七,比较优势的发挥。从经济增长速度、人民生活水平、GDP总量等多方面看,中国经济改革无疑是成功的。林毅夫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归功于比较优势战略。这一优势战略与“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战略具有一致性。“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特点是,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上,都能够发挥当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而不是脱离比较优势而进行赶超。当然,“亚洲四小龙”由于经济规模太小、人均拥有的自然资源太少也不能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18]在利用比较优势过程中,中国不仅获得了技术和资本,还取得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这符合合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chenkron)的“相对落后假说”和巴罗(Robert J. Barro)的“经济增长率的收敛假说”,即在经济发展初期,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越大,引入先进技术的余地就越大;初期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就越大。发挥比较优势的另外一种表达是郜若素(Ross Garnaut)的总结:恰当的地方和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方是指东亚。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日本以及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新型工业化国家进行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结构调整,有助于增加中国与东亚各国的国际贸易额和投资额。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与台湾地区 and 韩国的政治气氛缓和也促进了中国与东亚的贸易和投资。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出现了经济停滞,日本的结构变化仍然需要大量的进口和对外投资。恰当的时间是指日本等

东亚国家已经走过向发达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路了,一方面为中国开拓了空间,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做了榜样。另外,华人华侨正准备在中国寻求投资的机会。^[19]

第八,加入 WTO,全面融入世界。中国改革开放后,陆续加入了一些国际组织,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世界银行、IMF 和国际贸易组织是世界经济的三大支柱。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与世界经济变得不可分离,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关系越来越趋于紧密。在技术、制度不断创新的条件下,国际分工与协作的速度越来越快,经济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如果说,地理大发现后的经济全球化体现的仅是市场和产品的竞争,那么,21 世纪的经济全球化则更多地体现了资本、技术、制度等方面的竞争。中国经济已经驶入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参与国际分工,发挥比较优势产业,实现国内产业的“规模经济”,中国应该更加顺应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因此,中国在 2001 年加入了 WTO,全面融入世界。从 2002 年开始,中国的对外贸易水平有了显著的增长。

第九,危机与应对。中国从世界上获得的不仅是技术、资本和市场经济文化,实际上,自由市场经济所固有的一些弊端也给中国施加了影响。比较典型的是 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 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当今的经济全球化以金融财政扩张为特征,在资本流动越来越自由和金融工具不断创新的条件下,技术、经济和制度之间的张力容易导致资本投机以至于引发金融危机,并演化为经济危机。1997 年的金融危机是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的内在问题所致,也是索罗斯的量子基金攻击泰铢的结果,即金融资本在全球化扩张中追求利润的结果。这场危机影响了中国向东南亚国家的出口,也开启了中国启动国内消费市场的先河。由于采取了适宜的制度变革(比如住房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中国经济没有受到很大影响。2008 年的金融危机肇始于美国,因此,对世界影响较大,欧洲、日本无一幸免。面对这场危机,世界各国积极面对,中国政府更是启动了一揽子计划来恢复紧缩的信贷。2009 年,中国成功“保八”,超出了预期,成为世界上率先走出低谷的国家。

三、中国现代经济发展道路:“共同律动性”与“道路独特性”的统一

历史上,亚欧大陆就存在着共同的历史律动,只不过这种律动不是经济、文化力量所主导,而是基于所分享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比如,在气候恶化的条件下,游牧民族由北向南侵入农耕世界,由此便引发了东西国家的动荡和更迭。地理大发现以来,不同的文明和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基于自身的文化传统和分享的世界历史经验进行着互动和创造。中国现代经济发展道路体现了这一过程中的共同律动性,即与世界结构转换相联系,与世界历史演化大趋势相吻合;同时,由于文化、制度传统等方面的不同,在道路上也呈现了一些独有特点。

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认为市场经济社会的发展实际上受到两个完全相反的力的作用,一个作用力是人们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一个作用力是人们保护社会的努力。^[20]各国在 19 世纪末的工业化进程中,纷纷释放出市场的力量。但是,释放出来的市场的力量极具破坏性。到了 1913 年,支撑经济全球化的旧的国际经济秩序被摧毁,并使全球化的过程出现逆转,即保护社会的力量成为主导。在以后的 30 年间,工业化国家中出现了三种不同的道路或模式选择:第一种就是 1917 年十月革命之后出现的苏联社会主义;第二种是以德意日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第三种是以美国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这种世界经济结构的历史性变动直接作用于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和经济文化都曾经发达的国家,中国形成了一整套自洽的世界观,对文化、制度、技术也有充分的自信。然而,在第一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不仅失去了自己的领先优势,还要被迫应对来自西方的市场文化和制度。直至 20 世纪初共产主义的兴起,中国才找到与本土文化天然相容的,同时又能迅速发展经济的新模式,即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

苏联、中国、东欧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本身就选择了通过国有化来保护社会,并同时发展经济的道路。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也调整制度结构,降低私有制比重,加大国有化力度。这与波兰尼的保护社会运动相一致,即重新实现市场对市场的控

制,或将市场的作用限制在社会能够控制的限度内,并克服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初期,法国全国抗敌委员会的纲领就规定:“大型国有化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21]从1944年底到1946年期间,政府先后将雷诺汽车公司、法兰西电力公司、法兰西煤气公司、法兰西银行、里昂信贷银行、国民工商银行、巴黎国民贴现银行以及30多家保险公司收归国有,从而部分地掌握了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能源、交通运输和金融等重要经济部门。1946年底,法国国有企业在能源领域的比重高达90%,在金融领域的比重接近50%。

英国从1945年到1951年也推行以经济计划化为主体的改革政策。国有化即是这一改革的主要内容,先后将英格兰银行、煤矿、航空、电报和无线电通讯、运输、电力、煤气和钢铁等行业实现国有化。德国在国民经济恢复期间,也对涉及国计民生具有战略意义的经济部门实行国有化或国家控股、参股,20世纪50年代早期,国家在煤、焦炭、石油、生铁和钢的生产方面的份额占总产量的20%以上,在汽车制造、炼铁、炼铅和炼锌方面占50%,炼铝70%。^[22]日本战后也建立了相当数量的公有企业,主要分布在:铁道、公共汽车、航空、邮政、电话、电信、广播、电力、煤气、自来水等部门。美国的国家所有制,整体说来不如西欧国家发展迅速,但战争期间,美国政府也一度用财政拨款兴建了一些国有企业,特别是军工部门,其中政府投资超过了90%以上。这些制度性变革反映了对抗自我调节市场的社会保护运动的兴起。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主要症结是计划经济模式(苏联也遇到了同样问题)。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中国于1978年开始了改革开放进程。中国改革开放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与世界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暗合。即缩小政府权力边界,让个人和企业市场交换中体现自由,释放市场力量。这符合波兰尼的“大转型”思想,市场“脱嵌”社会的力量再一次占了上风。不仅中国是这一趋势的体现者,西方发达国家同样如此,一个显著表现就是重新私有化,重新强调自由市场的力量。

重新私有化的浪潮是1979年由英国发端的,逐步波及西德、意大利、日本、瑞典、西班牙、葡萄牙、

比利时、法国和加拿大等国。1979年5月,信奉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货币主义的撒切尔夫人出任英国首相,她主张:只有限制政府干预经济,发挥个人的创造力,实行市场经济,才能使英国摆脱困境。因此,她对将近20家国有企业实行了私有化,其中包括英国宇航公司、电报和无线电公司、布里托尔石油公司和英国电信公司等。联邦德国也紧步其后尘,制定了调整的方针:先将工业公司实行私有化,然后逐步向金融、旅游和其他行业扩展,最终打算出卖国有企业的全部股份。法国希拉克总理上台后,也摒弃了前社会党政府的干预政策,大胆实行了自由主义方针,逐步取消对金融市场和外汇市场的管理,放开加工产品的价格,削减法人税,放宽对临时解雇的限制等。此外,日本、荷兰、丹麦、葡萄牙、瑞典、西班牙、比利时等也开始实行全面的私有化。

当然,这种共同律动性并不能抹杀每一个国家工业化建设路径的多样性。由于文化、历史、资源禀赋等诸多因素的不同,每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都呈现了独有的“个性”。因为,“历史和地理条件对于经济、社会和制度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它们对经济政策也有显著的影响。”^[23]

作为工业革命的诞生地,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国家。依赖于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英国率先突破了马尔萨斯陷阱,实现了现代经济增长,从而导致社会变革,实现了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英国实现工业化之后,世界各国都开始了工业化追赶进程。但基于自身的文化、资源禀赋、社会结构等条件,每一个后发工业化国家的追赶道路都是不同的。

法国道路不同于英国,它的道路受到社会结构、自然资源和国家战略等因素的影响。法国的重商主义没有使商人地位得到本质提高,特权阶级仍然占据着社会的上层;人数众多的小农和手工业者构成社会的底层;阶层之间封闭性较强,等级之间流动困难,从而导致法国社会易于以激进的方式——革命来解决结构、制度上存在的矛盾。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自然导致了法国工业化的迟缓。在自然资源上,法国的煤矿少,煤层深,开采的成本高,因此没有诱致技术革命。法国注重发展大陆战

略,而英国注重海洋战略。英国成为海上霸主之后,获得了有利于工业化的原材料来源和销售市场,而法国则没有这个有利条件。

德国模式特点也很鲜明。英国的资本主义是个人资本主义,是在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下,通过个人的自主奋斗而建构成资本主义。而德国是国家通过有目的的制度安排和提供激励来促使国家工业化。这个工业化模式被称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24]709}它没有完全照搬别国的模式,而是根据自己的国情,根据自己所处的国际环境,采取了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来实行工业化。政府在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教育和科技为工业化做出了较大贡献。

苏联的工业化启动于19世纪60年代,但“俄国工业无论在产品数量还是在劳动力规模上,都与其生产的潜力和国家需求不相称。”^{[24]786}这种落后与苏联的思想观念有关。在提倡西方文明的时候,强调本国的特质以及这种特质所带来的自豪感。它不愿意放弃对“俄罗斯精神”的追求,也不能把传统的特质和工业化的道路很好结合。通过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苏联开辟了另外一种工业化模式。

工业化追赶中的最成功者,当属美国。美国有灵活的经济体系和政府强有力的指导政策,对工业快速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美国在英国的基础上进行了工业化创新,建立了更先进的生产模式。所以,尽管美国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却是工业化进展最快的国家。当然,不能忽视美国的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比如,美国没有封建文化,没有集权统治的历史,没有农业社会的意识形态,没有农业社会历史沉淀下来的风俗习惯等旧文化的约束,没有形成利益集团和官僚集团,美国的自然资源也非常富饶。

日本工业化也有自己的特点。首先,日本的工业化是在政府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其次,日本的工业化是非西方的工业化,其中蕴含了日本的民族精神。

与这些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的工业化路径呈现了自己的“个性”。先是洋务运动,试图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从而“师夷长技以制夷”,但由于制度、文化等多方面原因,洋务运动尽管在工业化建设上有了一些成就,但这种成就还不能与西方国

家,甚至与东亚的日本相比。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终结,从而使人们认识到中国的改革应该从器物层面转到制度层面。一些改革家,如王韬、郭嵩涛、薛福成等人提出“工商立国”、“振兴商务”、改革官制、建立议会等。1895年4月,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但维新运动最终也失败了。辛亥革命也没有让中国获得一个稳定的工业化建设环境。最终,中国选择了与苏联一样的社会主义道路。

同样是社会主义道路,所走的路径也是不同的。最初,苏联和中国都是选择计划经济模式作为工业化建设的手段。计划经济模式有其优点,那就是能够通过国家的强制力量迅速地按计划地配置资源,从而在短期内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然而,这种模式在信息交流成本不为零的现实约束下,扭曲了经济主体行为,难以实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与中国相比,苏联在计划经济模式上坚持了更长时间,并且错过了多次改革机会。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伴随着苏联解体,俄罗斯才以一种激进的方式重新回归到资本主义道路。但是,这种激进的转轨并没有达到“休克疗法”专家所预期的图景,而是经济陷入了衰退,人民生活水平持续降低。与苏联的激进变革相比,中国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做出了转轨的选择。中国本着一种“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的实用主义态度,对中国经济体制进行改革。随着实践的发展,中国在90年代初明确了制度转轨的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制度变革是以渐进方式进行的,在此过程中,社会保持了稳定,政府始终引领经济航船前行。改革开放的政府具有前瞻性以及现代化、工业化建设的紧迫感和领导力。从经济发展的速度上看,俄罗斯的转轨不如中国成功。转轨初期,俄罗斯的衰退甚至超过45%。^[25]但也并不能进行假设,俄罗斯能够走中国转轨之路。如斯蒂格利茨所强调的:“俄罗斯、其他独联体国家或者中东欧国家,并不需要简单地效仿中国的转型之路。各国的经济和社会性质都存在本质的差异,因此在政策选择和挑战方面也会出现很大的差别。”^[23]这正是每一个国家工业化建设的“道路独特性”使然。

四、历史回眸与思考:中国与世界

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经济发展也与世界

紧密相关。一方面,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另一方面,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

自古以来,中国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对世界采取了开放的态度,吸收世界各地先进文化和技术。商朝时产自西亚的小麦和大麦就沿着中亚、新疆河西走廊这条渠道进入了周人的祖先居住地陕西。张骞通西域以后,带回两个重要物种,一个是葡萄,还有一个是苜蓿。北宋时期,越南的占城稻传入中国,在南方普及,解决了当时中国南方对粮食的需求。15世纪、16世纪的航海活动,发现了新大陆,开辟了新航路,导致了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也带来世界作物栽培史的巨大变革。从新大陆刚传入欧洲的“新作物”同时也传到了东方。原产美洲的甘薯、花生、玉米等在明嘉靖年间陆续传入中国。除了这些技术传播之外,文化的影响和交流也沟通了中国与世界。约在公元纪年前后,佛教传入中国。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人的思想意识、民族关系、文化艺术、风俗习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除了农业文明时代的交流之外,中国的工业化建设也受益于世界的实践探索。苏联和中国在工业化建设道路初期采取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尽管这种模式从长期上看,存在着严重的弊端,但不能忽略的事实是短期内能够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这实际上是模仿发达国家劳动分工的收益。即发达国家通过逐步的社会实验发现了劳动分工的有效模式,经济发展的后来者可以越过劳动分工的中间阶段而直接模仿劳动分工的有效模式,从而进行大推进工业化。^[26] 转轨后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样借鉴了发达国家发展自由市场经济的历史经验和制度建构。

当然,世界作用于中国的方式不只是积极的,也有消极的一面。中国近代的经济落后成了列强进行资源攫取、市场占有、产品输出的理由。自从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就不断签订不平等条约,丧失部分主权和领土。中国大地的资源,比如各种文物、矿产都被掠夺到外国。纺织品等市场受到英国工业品的冲击,中国文化受到西方思想的冲击。反思这段历史,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制度和文化的独特或许可是“李约瑟之谜”和“韦伯疑问”的答案。因为正是这些看起来别样的制度和文化的独特形成了中国不能

走出“马尔萨斯陷阱”、不能摘除“布罗代尔钟罩”的原因。

但是,中国的作用却不可忽视,历史经验表明,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即便是人们所熟知的、看起来是欧洲社会自发演进成果的英国工业革命也并非没有中国元素。东方通过开创和向欧洲传播许多先进的“资源组合”(如技术、制度和思想),对西方的崛起做出了积极和重要的贡献。^[27] 公元600年后欧洲中世纪农业革命能够发生的大多数重要技术,似乎都来自于东方(冶铁、鼓风机、活塞式风箱、马镫)。在公元1000年之后,促使西方商业、生产、金融、军事和航海革命以及文艺复兴和科技革命的主要技术、思想和制度,都是首先在东方形成和发展,然后才被欧洲所吸收(焦炭、水力纺纱机)。在1700年后,刺激英国农业和工业革命的主要技术和科技思想都是从中国传播出去的(印刷术、火药、指南针)。此外,中国的思想还帮助推动了欧洲的启蒙运动(孔子自然理性思想)。^[27]

不同文明的交流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中国形象改变了走出中世纪的欧洲人的观念,甚至诱发了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最初的动机与灵感。马可·波罗(Marco Polo)那一代旅行家发现旧世界的最大意义是发现中国,而发现中国的最大意义是直接导致发现新大陆。而在斯密看来,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件事就是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发现美洲和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遥远的中国对西方人来说非常神秘且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包括思想观念、人与物产、生活方式。传教士们贩运回来的孔夫子的哲学与中国的道德神学,在欧洲的思想界产生了影响,中国思想与制度,成为精英阶层的文化时尚。总之,“1500—1800年的3个世纪,是中国对欧洲乃至整个世界产生较强影响的时期,而后来的两个世纪(1800—2000年)恰好相反,是欧洲和北美的西方文明在向中国施加影响。”^[28]

近年来,随着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中国工业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间,中国年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达到9.8%。在人类历史上,只有七个国家(地区)曾经以7%以上的年增长率持续增长超过三十年,中国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其中最大的经济体。不仅如此,中国还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平稳

转型,没有出现其他转型国家那样剧烈的经济和政治波动。这引发了“中国奇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等诸多判断。当然,中国是否形成了所谓的中国模式或道路,还需要历史证明。但无论如何,当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部分时都不值得惊诧,因为,中国曾经就是世界的中心。未来或许也会再次证明,中国能为世界作出独特的贡献。

参考文献:

- [1]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现代世界体系[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2.
- [2] 安格斯·麦迪森. 世界经济千年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10.
- [3] 安格斯·麦迪森. 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14.
- [4] 林毅夫,蔡昉,李周. 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30.
- [5] 马洪,孙尚清. 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03.
- [6] 吴承明,董志凯.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52)[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33-34.
- [7]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34-1435.
- [8] 郝平. 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382-385.
- [9] 董志凯,吴江. 新中国工业的奠基石:156项建设研究[M]. 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4:前言.
- [10] 吉尔伯特·罗兹曼. 中国的现代化[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216.
- [11] 丁明. 回顾与思考——与中苏关系亲历者的对话[J]. 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2):20-36.
- [12] 马泉山. 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66—1978)[M].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111.
- [13] 廖盖隆,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159.
- [14] 胡乔木.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
- [15] 邹至庄. 中国经济转型[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51.
- [16]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05.
- [17] 李岚清. 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16.
- [18] 林毅夫,蔡昉,李周. 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105-124.
- [19] 林毅夫,姚洋. 中国奇迹:回顾与展望[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3-34.
- [20] 卡尔·波兰尼. 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112.
- [21] 弗朗索瓦·卡龙. 现代法国经济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263.
- [22] 卡尔·哈达赫. 20世纪德国经济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60.
- [23] 斯蒂格利茨. 发展与政策[M]//斯蒂格利茨经济学文集(第6卷下).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488.
- [24] M·M·波斯坦. 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七卷[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709.
- [25] 劳伦·勃兰特,托马斯·罗斯基. 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M].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62.
- [26] 杨小凯. 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EB/OL]. 价值中国网,(2004-10-17),[2010-06-13]. 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4/10/17/1467_6.html.
- [27] 约翰·霍布森. 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M].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5.
- [28] 孟德卫. 1500-1800:中西方的伟大相遇[M].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13.

(编辑:夏冬;校对:杨睿)